

古华中篇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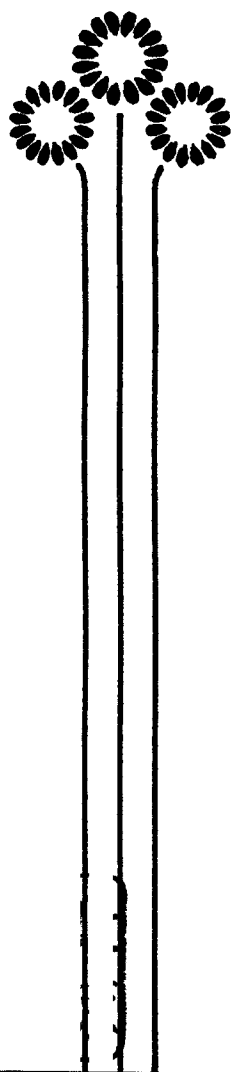


湖南人民出版社

GUHUAZHONGPIANXIAOSHUOJI

古华中篇小说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古华中篇小说集

责任编辑：张永如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82,000 印张：15.625 印数：1——12,300

统一书号：10109·1865 定价：(平装)2.20元(精装)3.00元



作者像

序

雷 达

这里的几部中篇小说，是古华同志继《芙蓉镇》之后的产品中的一部分，是他的湘南乡村长卷的拓展。他曾经说过，他之写作《芙蓉镇》，犹如站立在半山坡上，回首俯看二十多年来南方农村的风雨纵横，寒暑沧桑，“寓政治风云于民情风俗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那么，这里的几部作品，便是沿着半山坡继续攀援所采撷到的果实。半山坡离金顶还远，不能因为在半山坡上发现了奇幻瑰魅的景致，就再也驻足不前，甚或见岐路而返。那不是真正的山里人的气概。古华知道继续攀援的艰苦：不免于蹉跌，不免于划伤，不免于困顿，需要支付更大的耐力和韧性，但他还是把目光凝注于生活河流的滚滚浪头，不时地踮起脚尖，用全身心的热情，焦灼地企望看清入海口的壮阔，企望看清风雨过后紫霞烂漫的天际喷薄欲出的阳光。他不但正视历史的陈迹，更转而注目于新的乡村生活脉搏的跃动，一曲《相思树女子客家》，一曲《蒲叶溪磨房》，真可谓“琵琶起舞换新声”。这些作品，是伴随着苦恼的、不倦探索和追求的明证。苦恼中的上升，毕竟是上升，流连忘返的迷惑，其实是停滞。尽管这些作品的影响都还赶不上《芙蓉镇》，但我并不轻看它们在一个作家发展进程中的意义和价值，也决不轻看从中闪击出来的新生活的火花和光采。

说起来，我与古华同志的友谊还是《芙蓉镇》充当了媒介。在这篇长篇小说发表之前，由于我的寡陋，全然不知古华是谁，虽然他已有过二十余年的创作摸索的历史。《芙蓉镇》象一把火，燃起了我胸中的激情。我永远不能忘记初读这部小说时的感受。那是一个春日继续着一个乍暖乍寒的深宵，当我把排印着密密麻麻小字的《芙蓉镇》读完之后，家国之情，身世之感，一齐汇聚心头。历史的跨度如此之大，角色的交错如此之斑驳，浸透在小说中的对于左倾错误的反抗情绪如此之深刻内在，艺术批判的力量达到了令人扼腕顿足的境地。虽然小说对三中全会之后新生活的描写只占很少的篇幅，但江河行地，其来有自，那“尾声”还是如同春风吹遍了原野般显示着勃勃生机。我当时认定这是一部“奇书”，是我渴盼已久的东西。它用密集的生活的鼓点，敲打着每一个善良的灵魂；它用无可争辩的形象的冲力，宣告着长期形成的左倾错误的旧垒必然崩溃的趋势。那时，我把古华看得很“神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何以在手心里攥着那么多生活的矿石？他是谁？中国之大，真是人材辈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真想写一封信，祝贺他也感谢他，是他为人民酿造了一坛悲喜交凝的浓醇的文学酒浆。或许有人会笑话我的痴迷和偏爱，但当时的我，确曾抱着这种不能抑止的冲动。

然而，当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间小屋里见到这位“神交”中的古华时，激动的情绪却转化为冷静和礼貌的寒暄——中国人民现实生活里常常是这样的，我好奇地打量着他，觉得他的言谈举止尚未脱尽山里人的粗拙和憨态，可是，那双眸子和挂在嘴角上的笑意，却泄露着他内在的智慧、狡黠以至潜藏的幽默感。他很沉静，没有因《芙蓉镇》的成功变得浮躁起来。在我看来，他有一副农民的身坯和一双作家的眼睛，好象是山民和知识分子的奇

特的结合。后来，有过几次长谈，“神秘感”的消失代之以比较深切的了解。古华长我一岁，他的人生阅历却比我丰富得多。他是真正从生活底层挣扎着一步步走出来的。他来自山村榛莽，来自五岭腹地，懂得一草一木和布帛菽粟的来由。听他讲起自己当过十四年的农工，打草鞋，砍竹子，挑煤炭，修农具，管果园的各种营生，听他讲森林树木的各种品类用途，湘南山乡的各种习俗风情，民歌谣曲的悲欢情愫，我觉得他大致是个被山野的阳光雨露和民间文学熏陶、铸就的作家。如果说，当今作家的知识结构中有书本知识与生活知识之分，他偏于生活实践知识。这也许是他的作品里生活堆积的密度较大，而空灵和巧思较为欠缺的原因吧？

古华称他的小说是“严峻的乡村牧歌”。既是“牧歌”，却又严峻，此中道理，实足讨论。其实，照我的看法，这种“严峻的乡村牧歌”，也就是把“风俗政治化，政治风俗化”之谓。这本选集里的几部小说，显示着的首先就是这一重要特色。有些人不大赞成“乡土文学”的提法，我倒是觉得，只要不把这个提法作孤立地、偏狭地理解，应该承认，“乡土文学”毕竟是现代和当代文学中的一大流脉。而古华，正是一位值得重视的当代乡土作家。不过，对于“乡土文学”，人们的理解和追求往往相去甚远。我不大喜欢那些迷恋于“永恒”，醉心于“古朴”，赏玩着风俗，远遁着时代风云的所谓“乡土文学”。在许多“任何时代都可以发生的故事”里，我看到的只是艺术的凝固和僵死。活泼的生机在哪里？在于运动、速度和新生。一味地渲染化外的蒙昧之美，留恋和夸张行将解体和已经解体的古朴的宗法关系，等到这些奇风异俗最初的吸引力消失之后，还能留下多少东西呢？生活的力量属于不断新生的，催动着支配着生活旋转的政治经济的变化。作品的力量归根结底，还应归之

于发展变化中的时代精神的支撑。如果说，古华的乡土作品有何独特性，那么首先是他对政治生活的敏感。在他的笔下，不管描写多么荒蛮的所在，多么闭塞的山林，甚至没有一根电线，连收音机和香胰子都感到新鲜的守林人的木屋里，政治思潮的波及仍然不肯放过这里的每一个人。《芙蓉镇》里的古风旧俗变为“新”风恶俗再变为真正欣欣向荣的文明风俗，是读者深有感受的。《爬满青藤的木屋》中的盘青青，虽然嗔怪地对“一把手”说：“你呀！你还不如一条爬在木屋上的青藤！”已经有些沉醉于朦胧的爱情觉醒之中了。可是，她的感情的觉醒，“一把手”遭到贬斥，王木通的象“即将爆炸的火药桶”式的愤怒，难道能够逃出被扭曲了的政治生活的支配吗？这里的《浮屠岭》更能说明这个特点。这个离县城、公社都路途遥远的山寨，仿佛是新时代的“桃花源”，“天高皇帝远”。可是，当田发青秘密地分田到户，自以为万无一失，人不知鬼不晓的当儿，他早已触犯了“四人帮”的刑律；锒铛入狱的镣铐声，使这个犷悍不羁的山民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虽然他不情愿，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姐姐寨》是描写两代民歌手的悲欢感情和命运际遇的，应该说素材的地方风味很足，作者也有了施展他的民俗知识的用武之地了。但是，古华还是注意到了，即使是“唱唱山歌”，居然也可以大大地牵动“左的神经”，以至为了这“山歌”酿成了大祸，付出了惨重代价。也是围绕着“山歌”、俚曲，小说传送着新生活到来的信息，表达了青年一代农民渴望文明、爱情、思想解放的心情。《“九十九堆”礼俗》借用了一些荒诞手法，但在乖情悖理之间，扑朔迷离之中，表现了即使是偏僻的山冲，文明与愚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总之，我觉得古华乡土小说中的“乡土”，不是世外桃源，山村乐土，也非与世无争，静穆幽远，而是回响着政治生活的涛声。

其实，说他的小说政治色彩浓还不算十分确切；更准确些说，他热衷于剖析：从人与人的微妙关系中剖析古老的，传统悠久的，自有其惯性的转动节奏的中国农村特有的社会关系。也许他的刀法还不能说十分纯熟，手腕还不是特别刚劲有力，却也要学庖丁解牛，郢人运斤，试图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见微知著的功效。《芙蓉镇》写了一镇，《浮屠岭》写了一岭，《姐姐寨》写了一寨，《相思树女子客家》写了一爿客店，《爬满青藤的木屋》写了一屋……，这一镇一岭，一店一屋，绝非在题目上作文章——谁能说他的喜欢以地名作题目不包藏着一种追求？在作者心中，它们皆是大社会中之小社会，大时代中之小时代，是标本，是细胞，是缩影，是样品。对于这种创作意识，古华有自己的表述，叫做：反对“小家子气”。他说：“我想即使是一个从事乡土文学的人，如果对于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件毫无兴致，一无所知，而只是就事论事地把那些乡村里的人和事写得颇为生动，总难免透出一种文学的“小家子气。”这是中肯的甘苦之谈。如何摆脱“就事论事”的局面，打破胶柱鼓瑟的窘境，由“近视”转为“俯视”，升高立足点，不断提高对生活的涵盖力，确是古华多年来一直艰苦摸索着的难题。

我想，从“小家子”转为“大家子”，从小格局跨入广大空间，绝不是一个主观随意的问题。在诸多原因中，能不能从丰富的生活感受里达到对中国农村社会关系、经济形态、伦理道德的传统和现状的深切认识，也许是最关键的。中国是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国的农村历史悠久，传统深固，庞大而又复杂，要认识它的盘根错节的内部奥秘关系不那么容易。古华是热衷于对这种历史传统和现实关系进行剖析的。他的笔尖与生活的块垒相撞，常能迸发出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批判锋芒。读者会发现，在他的小说里，紧贴着人物和情节的，有一种“闲笔浪墨”，感而能谐，婉而多讽，

正话反说，反话正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些笔墨与通常所谓“小说中的议论”还不一样，也不是外加的佐料，而是形象的外延和扩展。试读《芙蓉镇》，夹杂在王秋赦，李国香，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这些形象描绘中的“评议”，常常是忽发奇想、尽情调侃，而机锋所向，无不批判左倾顽症和历史痼疾。《相思树女子客家》是作者面对新生活的一篇力作，写山区经济改革，极逞跨挪跌宕之势，诙谐而严正，喜剧中掺和着悲泪，观音以一个未婚女子，办起了女子店家，整肃店风，生财有道，真可谓巾帼须眉，敢冒山区古旧传统之大不韪。然而，面对守旧势力的“合力”，其难言之隐，夹击之苦，难以尽述。幸好有赵行书记的撑持，但赵书记也颇为复杂，纵有古道热肠，难抵众口铄金。小说结尾，观音姐做了中庸平衡的牺牲品。作者写她与赵书记的对话，激切而又尖锐。更绝妙的，是作者在写到赵书记面对上级大呼小叫要“查办”观音姐时，有一段“代拟训话”，好似赵书记的内心幻觉，又似一个看不见的人在发号施令：“赵行同志，不要对上级软拖暗抗！按兵不动！……这意思你懂吗？你总不能为了器重一个什么‘算盘精’、‘经济干将’，一个作风败坏的女人，丧失自己的党性原则嘛！女子店要加强领导，派几个党员进去嘛。乔三腊不是还当过几年经理？不能说，她一个党员一点不懂经济嘛！不懂经济就慢慢学。不懂的反面就是懂！谁他妈的一生下来就是经济专家？主要是要懂政治、政策，其次才是经济。位置不能颠倒了。啊，要清醒。注意！……。”这不知发自何处的“声音”真叫人啼笑皆非，读者在一片“嘛”、“嘛”的喧嚣中会忍不住哈哈大笑。可是，这个“声音”里的混乱逻辑，包括它的腔调，谁不熟悉？这些反话里，其实有骨头、有芒刺，狙击之辛辣，足可提神醒脑。象这类例子，在古华的小说里错落有致地穿插着，大约可以看出他的叙

述风格中的锋芒所在，也可看出他力图解剖农村社会关系的勇气。

人们都说古华的小说里生活实感强、密度大。我认为，他的作品经济细节的准确和丰富，值得注意。他在《芙蓉镇》里算过一笔帐，直算得胡玉音鼻子冒汗，脸色发白。这笔帐收支明细，无懈可击，把个卖米豆腐的女人的小家底全然揭明，怎不使那个年头靠蝇头小利谋生的人胆战心惊？他在《浮屠岭》里又算过一笔“大锅饭”的帐，把生产队的口粮拖欠、现金亏空算得一清二楚，凿凿有据。难怪那位老队长精神崩溃，了却残生。他在《相思树女子客家》里也算经济帐，直算得乔三腊无地自容，观音姐扬眉吐气，从而开出了经济改革之路……这些细节，或不为某些小说家所重视，但我认为，不是对农村经济十分稔熟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写小说固然不是“算帐”。恩格斯称赞巴尔扎克小说里的经济细节比专门的经济学家还丰富，红学家称赞《红楼梦》足可成为研究封建社会末期经济形态的底本，这都不是它们的作者的初衷，谁也不会为了后代研究经济才写小说的。然而，对于一个有志于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和运动趋势的作家，他是不应该看不到潜藏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巨流的奔突的，他也不能不发现经济根源如何实际上支配着人物的意识和情感。至于是否在小说中直接描绘具体地经济活动场景，那倒是因题材、手法的不同各有千秋，不必一律。我从古华小说中农村经济内容的丰富翔实，悟出了这是形成他的艺术说服力的原因之一。我从这里还联想到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由于长期“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迷误，形而上学地对待阶级分析学说，我们许多作家的思维方式是否受到了扰乱和破坏，以至今天许多作者仍然只是习惯于仅仅从政治态度、思想观点、道德面貌去观察、认识、评价生活和人物；

是否我们许多人尚缺乏经济头脑？在今天，这个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时代里，我们是否有必要多多强调研究经济的迫切性？

当然，我在以上指出古华的乡土小说中政治色彩浓厚，经济细节丰富，不时闪现着对社会生活的批判锋芒，是仅以一个作家拥抱生活、把握生活的特点着眼的。我们不会忘记，作为一个小说家，他惨淡经营，刻意求之的仍然是人物形象的创造。他的引起人们注意，正是他带着几个面目独特，血肉丰富的人物登上了文坛。《芙蓉镇》里的吊脚楼主王秋赦，“政治女将”李国香，“北方大兵”谷燕山，“芙蓉仙子”胡玉音，“铁帽右派”秦书田，读者铭记难忘。古华的人物夹袋里，角色不能算少。他注意人物的个性生命，注重每部作品里人物关系的色彩调配、对比均衡。《爬满青藤的木屋》里，王木通、“一把手”、盘青青形成鼎足而三的犄角之势，各自的独特性未可忽视。《浮屠岭》涂着浓重的传奇色彩，在这个“亡命之徒”丛集之乡，作者创造了田发青这剽悍勇武、敢作敢当的青年山民形象。他一脚踏在“学大寨”的讲用台上，强作镇静，一脚踏在阴暗牢房的门槛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给无意中泄密的爱妻的一记耳光，显出他的英雄气长，义重如山，使一个山村男子汉的魁伟形象矗立在读者眼前。《相思树女子客家》中的山区女改革家观音姐，外柔内刚，胸有成竹，是作者人物像册中最新也是最成功的角色。她在精神上的风度气势，使胡玉音、杨梅姐、盘青青、秀秀们相形失色。如果说，古华的女性形象渐渐有了重复之嫌，那么观音姐以其聪慧果敢，凌人气势，挟带时代风云，令人耳目为之一新。

古华的小说，为读者喜闻乐见，走的基本是传统的民族化的路子，所谓“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他的语言，有泥土情调乡土色彩，有黏着力和趣味性；他的人物，打着民族

心理素质的烙印；他的情节，叙次井然，首尾相衔，颇能引人入胜。近几年，他不断吸取新的手法，逐渐形成一种凝重厚实，悲喜杂糅的清新的艺术风格。据他说，他的题材大多“利用生活现成的人和事，进行改造、提炼，努力使之典型化。”这一方面固然使他的小说朴实自然，“少了一些斧凿痕迹；”另一方面，是否也多少要受生活原型的约束，贴生活太近，不免板结胶滞，缺乏飞动之势呢？这与那种由一段情节，一股情绪，一二人物，突然逗引作者点燃全部生活库存，达到感情酣畅淋漓的渲泄的创作有所不同。我认为，各种方法均可采纳，不必定于一。更紧要的是，中国农村，经济起飞，人事更替，云翻雨覆，新的生活迫切需要新的构思、布局、手法去适应。如何克服“思维定势”，谨防“风格老化”，在表现方法上“削去脂肪，抽出懒筋”，消除冗繁拖沓，肉多于骨的弊病，让活跃想象力和敏锐的表现力巧妙结合，或许正是摆在古华和众多农村题材小说家面前的新题目。

芙蓉镇很美，姐姐寨多情，惜乎终非久留之地。我在《相思树女子客家》中，已经看到了作家改弦更张，另拓新境的富有成效的努力。寄语古华同志，勇敢地拥抱新的生活，大胆地写出中国农村新鲜的血和肉来吧！

我从来没有替人作过序，自忖也不宜于替人写序；但盛情难却，我勉为其难，写了以上的话，谬误之处，尚祈鉴谅。

一九八四年八月写于京郊

目
次

序 雷 达(1)

相思树女子客家……………(1)

金叶木莲……………(75)

“九十九堆”礼俗……………(133)

前边才是夔门……………(184)

姐姐寨……………(236)

浮屠岭……………(342)

相思树女子客家

一

五岭山区有个相思坑。都说相思坑里风柔雨嫩，雾走云浮，好一方山林乐土。其实相思坑不是个坑，而是一座绿树浓荫、溪涧密布的峡谷。它是不是山林乐土，我们先不忙答复。反正林场场部设在这里，公社管委会也设在这里，有上千居民呢。至于为什么把这峡谷叫做相思坑，不雅视听，那是老辈人的责任。或因为什么节妇殉夫的古老传说，或因为本地方的女子多情重义，或因为这里曾经长满了红豆杉，相思树，等等，谁说得清楚？又没有人来做地名考证。相思坑就相思坑呗！相思坑地方的男子汉一个个出息得上山能打虎、能伐木，下水会放排、会炸鱼，喝酒、打架、喊山歌，比天底下哪个角角落落的好汉们都差不到哪里去；相思坑地方的女子们也一个个出落得水灵水嫩，重情重义，会编筐，会结席，会守着男人养猪打狗，当家理财，生儿育女。所以用不着嫌恶这地名。地名不好，只要人中用。人不中用，你就是把它改成“红卫坑”、“朝阳坑”、“大寨红旗坑”、“世界革命坑”，银样镗枪头，于国于家何益？

相思坑公社书记姓赵，百家姓里头一名。大家叫他“灶神爷”，管百姓吃喝拉撒的。他自己开自己的玩笑：小姓赵，单名行，正

八品。县委书记才是正七品。还有副七品、副八品呢！八品芝麻官是也。他爱人也因此被列为“八品夫人”。古老的品级爵位有了新发展。

近些日子，为了公社下属企业“相思树女子客家”的严重问题，赵行书记抓头抓脑，头发都熬白了。因为“相思树女子客家”的店长观音姐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你个二十八、九岁没出嫁的风流女子，为了招徕宿客，多捞票子，都搞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出卖色相？“明是客店，暗是花院”，人家有根有叶，有名有姓地告到了县里。县委财办连着来了三次电话，要他赵行严肃处理。县委分管财贸政法的书记就是他老丈人。打击经济犯罪，取缔非法经营。决不能心慈手软，姑息养奸。若还继续软弱涣散，只顾经济收入，不顾政治影响，不抓不办，就由县公安部门出面处理。那时可有你赵行的好戏看。难怪早就有人风言风语说，无亲无故，赵行准看中了颇有姿色的观音姐，讲不定两人早有了一腿子的姻缘。无风不起浪。赵行今年刚做了五十大寿，他那“八品夫人”乔三腊，还因此打翻了酸醋缸子，在家里闹翻了天呢？

县里的电话讲得明白：处理这类问题，办法很简单，改组“相思树女子客家”的班子，派几个党员进去。不懂经济、不懂管理不要紧，无非先赔几个月本，交学费。政治这个“本”却不能“赔”，“赔”不起呀！不懂经济、不懂管理就学嘛。谁是天生的？不懂的反面就是懂嘛！

隔山放屁，臭得远哩。间间办公室有电话机，由秘书先挂通了，再由领导亲自捏着话筒作指示。虽说相思坑地处五岭大山，离县城一百二十公里，可拿起话筒就到了鼻子底下呢。好在赵行也是只亚热带林区的老麻雀，见过几番风雨的。县里连下三道金牌，责成他查办“女子客家”这事，他在公社院子里一个字都没

有走漏。事关重大，事有来头。这事他已经软顶暗拖，搪塞了半年了。上级不听他的，他也不想听上级的。能拖一时是一时。他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他公开反叛，却又缺乏勇气、魄力。下级斗不过上级，只能服从上级。再过十年就退休，犯不着吃眼前亏。都五十岁了，好年月都贡献给一次次运动风雨斗争烈火了，他再陪不起。只能搞点迂回战术。倒是要仔细想想，这“相思树女子客家”的“祸水”，是怎么泛滥开来的？他又是怎么惹下这浑身鱼腥味、羊骚味来的？难道真应当看破红尘，大悟大彻，求得六根清静，无我无为？

二

原来这“相思女子客家”，本名“相思树客店”。因全店子的服务人员，除食堂大师傅以外，是一色的山里年轻女子。又因她们服务热情，待客亲切，一些常来常往的客人开玩笑，就喊成“相思女子客家”了。小店店长观音姐，也觉得这名子好听，就随客人高兴，没予纠正。店里的正事还忙不过来呢。客店紧靠在林场停车坪的山边上，是一栋老式会馆建筑，青砖青瓦，上下两层，中间是过道长廊。据说解放前相思坑地方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土匪寨子，这栋会馆式楼房即是匪伙们行劫归来分赃聚赌的场所。一些从两广、两湖地方掳来的良家女子，也陆续关在这里，成了赌院加妓院。解放后这楼房成为公产，做过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后乡人民政府发展为人民公社，另盖了办公楼院，这里便降格为公社的万头猪场，还驻扎过公社的钢铁大军。没过两年，便租给商业部门做山区土产竹木收购站。“文化大革命”初期又曾被本地的造反兵团占领，成为“文攻武卫指挥部”。直到后来省里在相思坑地